

文化产业与中国问题研究书系

新型城镇化与 文化产业转型发展

胡惠林 单世联 ——主 编

A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化产业与中国问题研究书系

新型城镇化与 文化产业转型发展

A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胡惠林 单世联 ——主 编
江 凌 李康化 ——副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产业转型发展/胡惠林,单世联
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7-208-12611-4

I. ①新… II. ①胡… ②单… III. ①城市化-研究-
中国 ②文化产业-产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299.21 ②G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1544 号

责任编辑 黄玉婷
封面设计 储 平

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产业转型发展

胡惠林 单世联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1 插页 3 字数 351,000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2611-4/G·1695

定价 55.00 元

前言

新型城镇化：重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秩序

胡惠林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中国来说,它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中国许多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对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解决。2014年3月16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大幕,如何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对于中国文化产业来说是一次重大历史转型。

—

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和机遇,是使文化产业成为今天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最重要的历史与现实动因,目的是解决国家发展战略问题,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和东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发

展的形态结构与生产力结构有着自己的典型特征。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文化产业形态,以农业文明为基础、以大规模机器复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现代文化产业形态和以信息文明为基础、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新兴文化产业形态,建构了现阶段中国最基本的文化产业结构体系。这个结构体系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结构体系的反映,与中国东、中、西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基本相一致。人—地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人的一切关系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是人与自然、社会一切文化关系的总和。当人—地关系转变为人—社关系的时候,一方面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扩大再生产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制约了社会生产力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资本的供给能力。两个制约的结果是市场不发达,需求得不到满足,政府负担过重、责任过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但是长期以来农民可供支配收入过低,使得他们在维持基本温饱的基础上很难有满足基本文化消费需求所需要的购买能力。农村文化市场的不发达,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化市场的规模化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规模化,从而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始终只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潜力。要实现这种巨大潜力的释放,首先就必须释放它的巨大需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进程,为实现这种伟大的释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从制度上进一步保障这种释放的永久性和中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和确立,无疑从根本上为确保这种释放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形态不仅表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上,而且主要表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组织和社会管理与治理结构上。国家一切资源的配置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一二元结构而建构的。物质生产资料的配置是如此,精神生产资料的配置也是如此。然而,由于“精神生产资料”的定义有着远比“物质生产资料”更为丰富的复杂性,因此,消除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与社会共同努力和奋斗的目标。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包括精神文化资源配置在内的国家资源配置都一直严格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因此,任何对于这一基本结构关系的变动都涉及国家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进而导致国家和社会资源结构的大调整、社会结构的大转型。城乡二元结构历来都不是简单的社会经济结构,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文化结构。

城里人和乡下人、市民和乡民、村民和居民历来都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建构。但是,中国城市和乡村在文化上尤其在心理结构上,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

的截然对立的构造,而是在彼此认同上建构对方和自己。这与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城乡运动的相容性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农村从来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村,城市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类似于西方城邦),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由于绝大多数的城里人血管里流的血都是源于农村的,即便在今天,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乡愁”情结,都在精神文化心理深处归因于“原籍”——一个乡村家园。这就是每到春节,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几亿人口的“春节迁徙”:回家过年。城里人的乡村认同使得农村天然地具有精神家园的性质与特征。尽管人们还是不习惯乡村的落后,但是,不能忘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城镇化本质上一定是一个新型的文化化进程。这也许就是大家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那么什么是人的城镇化呢?也许正是这一极为重大的问题建构了新型城镇化与中国文化产业转型发展的关系。

二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它不仅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传统对立,而且将从根本上重建社会的权力结构。尤其是户籍制度的历史性改变,将从制度上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奠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城镇化将不仅造就新的中国社会结构形态,而且将造就新的国民结构形态。户籍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到来,城镇人口结构的大规模重构,标志着—个全新的社会生产力结构时代的到来。这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力结构时代的到来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人们的社会文化消费需求结构的巨大调整和文化生产力结构的巨大改变。中国社会因人口基数的巨大所蕴含的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现代化和文化人口比例的不断扩大而出现前所未有的“井喷”现象。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准确预测到它的时刻表,但是,常识告诉我们,随着可供支配收入人口的巨大增加,随之而来的文化消费人口的巨大增加一般来说是同步的。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段中,城市和乡村是两种存在着巨大差异的文化消费空间,空间构成的差异性,使得城市和农村的文化消费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巨大的历史性差异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这种差异。在中国,“镇”是农村与城市间的“过渡体”,同时兼有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特征。说它是农村,它的常住人口却属于“居民户

口”，并且拥有比乡村完备的包括文化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机构和乡村所缺少的较为丰富的文化市场构成；说它是城市，它却是典型的农村集市形成的生活空间，属于乡村中的“都市想象”（因为，在中国农村“城”是一个有这样意义界定的文化空间，如“县城”，更多地包含着权力象征），甚至是同一户人家不同的人员都可能归属于不同的户籍管理，一个家庭同时拥有“居民”和“村民”两种人。这种家庭结构典型地阐释了“镇”的文化空间属性：亦城亦农。新型城镇化打开了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式“城镇”空间，从而使得多少年来、多少代来渴望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为市民，变村民身份为居民成为现实。巨大的梦想的实现，必然带来巨大的新的梦想的建构与追求。文化消费是最能满足人们炫耀性消费满足的实现方式。这是一次巨大的文化空间的扩张与再造。如何满足即将来临的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这是新型城镇化给中国文化产业带来的新命题。扩大文化生产能力，提高文化产品质量，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将真正在社会生产力的意义上对现阶段中国文化产业发挥结构性变革作用。

城镇化作为一种有着巨大刚性内需的社会变迁，早已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掀起而起步。尤其是那些比邻大城市的村镇的城镇化，不仅为新型城镇化积累了经验，而且也提供了不少教训。深圳大芬村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与扩大，很有可能“城镇化”与“逆城镇化”进程同时出现，这种现象表现在文化产业发展上，一方面是传统的农村文化产业形态进入城市创意产业，以“民间”手工艺的形式注入“都市文化之河”，从而使都市文化在发展都市文化创意产业、改造工业文明遗产过程中获得全新的生命形态，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支持；另一方面是传统农村文化产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直接越过“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权利束缚，而直接采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新兴文化生产方式赋予传统的文化产业形态以全新的表达方式，以“民间文化产业”的方式解释现代技术世界对于农耕文明传承发展的全部价值。更有甚者，资本对于成本和利润的精算，使得村镇的文化投资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关注与掘金。城镇文化产业化已然成为许多古村名镇新的存在方式与价值表达。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秩序在被解构的同时，也被建构了。村镇进而传统的民间文化产业，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再构进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中国文化产业如何在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转型发展，也许就是“新型城镇化”带给我们或启发我们关于中国文化产业走向的一些思考。

三

有两种文化形态,一种是流动的,随人的流动而流动,并不断在流动中改变自己的形态,所谓“随物赋形”;一种是静止的,随人的定居而在物质的物理层面上把流动的文化凝固化、固定化。所谓“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概就是对这两种状态的划分。城镇是一种静止的文化形态,它把流动的文化在一个空间的位置上以固定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得流动的文化拥有一个空间形态的可视化表达,从而使得这种表达构成了一种景观、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文化空间符号。正是这种可视化的空间形态,使人们把自己与他者做了区分,使得人们观察到了和认识到了文化流动在空间表达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有文化的、文明的和审美多样性的时空表达。正是这种表达验证了和阐释了文化的无限丰富性和可成长性、可持续性。在故乡老家的宅基地上“碉楼”,既是岭南文化的凝固性表达,同时又包含着“游子”对“他乡”文化的一种传递。正是这种“故乡”与“他乡”完全不同的空间对流和时间流转,从而使得“东平碉楼”成为一种文明多样性在东方的成功阐释而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际文化遗产名录。用一种凝固的空间承载、寄托和表达对故乡文化的眷念并且在他乡的空间上表现出来,这构成了中国城镇一种极为鲜明的时空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会有“中国城”和“唐人街”的原因。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和族裔认同。它是凝聚力的根源。因而,城镇的兴衰历来都不是一种居住空间物理形态的毁、建,而是文化流动的结果。新型城镇化,毫无疑问,又一次推动了文化的大规模流动和结构变迁,甚或很有可能随着户籍制度的同步改革而翻江倒海、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新型城镇化后,留下了旧时的城镇遗存。它们是静止的,默默地看着、经历着、承受着并体验着自己曾经有过的光荣与梦想,以及带给自己和留给自己的全部价值构成:文化遗产。或许它们在新型城镇化的现代进程中获得再造,如深圳大芬村,或者它们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消亡。如浙江乌镇,一个没有了鲜活生命栖居、只是过路的背包客的客栈。白天的跃动进一步验证了黑暗降临后的沉没。而一个真正鲜活的生命,即便在黑暗降临了,他依然在跳动着,因为,他有灵魂。更不用说那些空心村了。然而,这恰恰是浙江省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旅游产品,一种文化产业新形态。新型城镇化,在文化的流动和静止中将重新塑造流动与静止的样态。文化产业是文化的这两种样态的存在方

式与表达形态。大芬村也许是做成了产业：文化加工贸易——油画来样加工，而乌镇则仅仅是把一个鲜活的古镇掏空，进而把它做成一个旅游产品供人旅游消费。这对许多个“类乌镇”来说，生乎？死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很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新型城镇化给予中国文化产业转型发展巨大影响的巨大启示的。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是共识。没有人了，一定不是新型城镇化。但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包括哪些内容和基本要素呢？也就是说它有哪些可操作、可衡量的指标和标准呢？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不同历史的进程中和不同的空间范围里有着不一样的内涵和内容。一个还处在解决温饱地区的城镇化和一个要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地区的城镇化显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衡量标准和指标要求。但是，不管这两种存在巨大落差的城镇化有着怎样的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标准，就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文明转型的现代化，包括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建立在文化产品供给高度丰富基础上的文化消费的充分满足与实现应该是其一个重要体现，不仅如此，文化消费的充分满足必然同时带来文化表达充分实现的需求，而恰恰是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动力。于是，原先两个方面的平衡便被打破了，出现了新的竞争性不平衡，原有的城市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一边倒的优势，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被打破了。文化产业发展在这一历史性进程中需要获得新的平衡，就必须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塑造自己，重新建构自己，以适应新型城镇化带来的这两个方面的战略性需求。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秩序便在这当中被重构。

城镇在中国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空间形态。这种文化空间形态不仅在时间上有着巨大的差异性，而且这种文化空间本身就是一种时间的产物。不同的文化空间拥有不同的文化权力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分工结果，但是，一旦这种分工成为一种文化分配形式并且被制度性固化的话，就可能遭遇到文化正义问题，进而文化产业正义问题。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差距是造成中国文化权力空间存在不合理的历史原因。通过制度性配置改变这种历史生成的不合理性，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在发展文化过程中作出的重要努力。行政配置大规模地改变了不少落后地区和边远省份文化发展不合理的局面，而长期的资源配置固化也使得原有的历史合理性逐渐地发展和演变为现实的非完全合理性。任何一种对原有资源配置合理性的重新安排都需要合法性理由。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这种理由，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资源配置在文化体制改革的

历史性进程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还是缺乏根本性的制度性依据。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为这一历史性、合法性建立创造了根本性制度基础。由于城镇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步发生,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原有的城乡人口文化构成,这种城乡人口文化构成的根本性转变将使得原有的城乡文化权利和权力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化表达、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文化传播方面是革命性的。这种革命性对文化产业的转型发展来说,既是巨大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巨大的历史挑战。如何抓住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机遇,推动和推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推动和推进“三农”的有效解决和新农村建设,使之成为推动和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成为扩大文化内需和促进文化产业升级转型的战略支点,对中国文化产业转型发展来说,都具有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自然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与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

这就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问题。

2014年9月26日于上海秋高气爽时节

目 录

前言 新型城镇化:重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秩序

胡惠林[001]

■ 经济社会转型与文化产业理论

文化产业政策的中国特色和现实逻辑

单世联 付延慧[003]

试论经济转型的文化动力

——文化生产、文化产业与社会秩序

刘 涛[024]

生态文明框架下文化产业转型发展:方向、问题与对策

徐艳芳 王 蔚 赵晓涵[036]

转型时期我国文化企业的成长战略研究

朱文静 朱 婷[050]

日常生活转型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

周全明[060]

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

韩顺法 肖泽磊[069]

文化产业分行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江苏经验的比较研究

胡慧源 吴建军[080]

■ 新型城镇化与文化产业转型发展

论城市化与文化产业空间组织形式转型

胡洪斌 杨传张[101]

城镇化对文化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与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 31 个省区市面板数据的耦合分析

高乐华[109]

城镇产业转型视角下的文化耦合发展

——基于“中国乐谷”模式的分析

许立勇 陈娴颖[119]

新华模式: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产业转型

王 佳[137]

转型与升级:台儿庄古城再生的经验与启示

唐月民 宋 暖[148]

破解用工荒与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思考

——基于低度文化创意产业的视角

林存文 吕庆华 郑秋锦[157]

文化产业促进煤炭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思考

陆 耿 刘和远[173]

城乡文化与文化产业协同创新

城镇化与文化产业互动发展的逻辑与价值

段 莉[187]

城市名人文化资源开发:因应、作用与路径

江 凌[204]

城市群文化产业内生增长与区域协同研究

咎胜锋 李翠萍 李 娇[217]

复杂环境中文化与科技产业协同创新研究

苏 卉[227]

三维框架下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设计研究

林明华 杨永忠[237]

经济转型背景下文化产业制度体系创新

——以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为例

张 军[251]

城乡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

行走在保护和发展的悖论之间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关系研究

格明福[267]

文化安全视角下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王 元[278]

城镇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以北京“非遗”传承人“家庭博物馆”为例

李 艳 高传智[292]

我国地方传统工艺产业化发展模式探析

秦宗财 房 凯[300]

试论黄梅戏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

秦 枫 赵雅兰[310]

后记

胡惠林[325]

A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新型城镇化与
文化产业转型发展

经济社会转型
与文化产业理论

文化产业政策的中国特色和现实逻辑

单世联 付延慧*

摘要:基于中国权力结构的特点,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一般先由党中央、国务院下发通知、意见,然后由政府机关制定并下发各种“实施方案”、“办法”、“细则”等予以具体化并贯彻落实。基于中国意识形态管理的特点,在大量显性政策之外,中国还有若干隐性政策。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起点和核心是文化体制改革;其次是文化经济政策,包括放宽文化产业准入政策和支持金融机构参与文化产业发展;再次是制定和发布了若干更为积极而具体的产业发展规划。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政策无论是政策制定、政策文本还是政策的效果,都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政策制定主体分散、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较差、政策支持产业的力度不够等等,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完善。

关键词:文化产业政策;中国特色;现实逻辑;问题思考

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体制改革为起点,以经济全球化为语境,中国文化产业迅速兴起并蓬勃发展。一个乐观的评估是:文化产业增长势头强劲,总量和规模逐年递增,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文化企业迅速成长,骨干企业开始壮大,生产能力极大提高;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日趋紧密,产业门类渐趋齐全,新兴产业异军突起;投融资体系建设与文化资源开发走向规范,集群化趋势基本形成;文化产品出口增加,文化贸易繁荣;文化市场空前活跃,文化产品和服务内容日益丰富。2004 年以来,文化产业年均增长率在 15% 以上,比同期 GDP 增速高 6 个百分点。原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认为:“总体看,

* 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媒体与设计学院党委书记、文化产业与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产业理论、文化思想史。付延慧,女,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基地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产业理论、文化产业政策。

我国已步入了演艺、影视、出版、艺术品、动漫游戏和网络文化生产及消费大国的行列。”^①可以说,文化产业已经改写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的版图,也有力地参与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当然,大国不是强国。据 2004 年的评估:“我国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在世界 15 个主要国家中以 0.22 的竞争力指数排名倒数第一,比同属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南非和印度还分别低 0.01 和 0.02。”^②这一状况至今也还没有根本改变。数量的巨大和竞争力的低弱,是本文评论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背景。

一、文化产业政策的中国特色

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很多,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松绑、政策推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任何现代国家,文化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都是体现政府意志、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中国,党和政府如此迫切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为此制定的政策如此之多且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则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素和复杂的体制因素。

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等沿海城市,文化产业就曾有过局部的辉煌。1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基于革命理念和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抱负,继续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试图用政治动员而不是市场的方式推进经济发展。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引进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体制,直到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市场意义的文化产业发展已基本不复存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强大而严密的管理系统,并将所有的文化机构和文化生产企业纳入意识形态的管理系统,成为计划体制的“事业单位”。文化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新闻出版是党的“喉舌”等,是这一时期文化生产的主导观念,并有制度化的落实和保障。文化资源为国家所有,文化生产和传播主要由国家投资并由国有事业单位完成,各种文化生产者均为宣传文化系统的“国家干部”,文化消费与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紧密相联,与文化有关的一切行为基本上被视为意识形态行动与公益性行为,以至于公民的文化消费基本上不花钱或只花不多的钱。总之,这一时期的文化高度政治化、国家化,而支撑、规范、调控文化发展的则是党的文化政策。毛泽东曾

① 欧阳坚:《文化产业政策与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 页。

② 祈述裕主编:《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 页。

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制定出各种文化政策并由全国各级党政管理部门严格执行落实。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题材、内容、形式和风格,乃至演员工资、剧院票价、电影放映时间(通常两个半小时)、作家住房等,都必须有政策依据。这种以统一的文化政策、严密的文化管理为特征的“计划文化”,保证了中国的文化建设较好地配合了党和国家的需要,也部分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生机不足、产能低下、产品和服务单一等严重问题。

如果说,西方文化产业随工业化、城市化而来并在工业文明的后期迅速发展,那么,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在政治主导、政府掌握一切产业和资源的管理体制中,没有党和政府最高权威机关的认可,没有自上而下的政策松绑,发展文化产业是不可能的。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和以政治运动为治国方式的“左”的错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建设四个现代化为发展目标的新的政治路线,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有三种力量直接推动了当代文化产业的兴起:其一是文化开放。政治和权力放松了对文化的控制,意识形态部分地退出社会生活,文化的审美属性、娱乐属性、商品属性、经济属性等因此得以呈现,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文化研究,都日益关注文化的多方面价值以及在满足公民多方面需求上的功能。其二是长期受到压抑的公民文化需求的初步释放,文化消费开始形成。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这是公认的文化市场出现的标志;中国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曲磁带以各种非正式的方式进入大陆,通俗音乐、轻音乐开始流行;生活类出版物出现,通俗杂志大量涌现;电视机开始走进普通家庭;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电影、电视剧进入内地等等,逐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的“生活文化”形态。其三是文化事业单位转型。这一方面是政治路线改变之后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政府急于减轻财政负担,不再承担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全部经费有关。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7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第一条外国商业广告。在经历了一系列试点探索和广泛实验之后,1998年,国家提出要在三年内取消部分事业单位政府财政拨款,要求电视台等事业单位在三年内全面实行自收自支。上述三种力量都把文化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早在1980年2月,全国文化局长会议就第一次提出了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很多,严重影响了表演艺术的发展和提高,需要进行合理的改